

吴老的教导与我的考证

祁振声

(1940~)，河北农业大学，副编审。

2013年6月21日上午，我请打印室将我的《“八角金盘”原植物考证》和《对鬼臼“同物异名”的疏分》两篇论文，发至吴老办公室，以供参与《中华大典》中《植物分典》编纂的同仁参考，并照例挂电话，想说我的编典可告一段落，并询问吴老病情。岂料，康珠同志却在电话中说：

“吴老昨夜去世，我们都在忙于此事。”噩耗传来，犹如晴天霹雳、五雷轰顶，又像突然降临的狂风暴雨，几乎将我击倒于地。“往事依稀翻作梦，都随风雨到心头”。那些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逐渐模糊的一件件往事，又浮现在脑际，而且越发清晰，成为永远难忘的深刻记忆。

吴征镒先生虽是我早已心仪的植物学泰斗，但直至我1978年调入与中科院昆明植物所毗邻的云南省林科所（后改云南林科院）从事期刊编辑工作，才有幸经常登门求教，亲聆教诲。在我的心目中，他既是一位可亲的慈祥长辈，又是一位治学严谨、循循善诱的恩师。我在古籍记载植物考证上取得一些成就，与吴老过去的谆谆教导、热情扶持和严格要求密不可分。

我虽长期在林业系统工作，但对林学和植物学却是外行。我原学道路桥梁工程专业，曾在云南林业勘察设计院从事林区公路桥涵勘测设计，踏遍云南的山山水水。“植物王国”多姿多彩的植物，深深吸引了我。但因缺乏植物学知识，也曾闹出不少笑话。例如，在上世纪60年代，我曾将具有鲜红肉质假种皮的红豆杉种子误认为是“果实”，还因不知半截红半截黑的种子是“相思子”，引起误会而导致初恋的失败。此后，我才决心自学植物学和林学。但只是将现实植物与书本上的图文相对照，而缺乏名师指点。林科所所长肖敏源先生见我对植物分类感兴趣，曾给予不少帮助。他与吴老早有私交，还经常将林科所采集却不能鉴定的标本，交由我请吴老帮助鉴定，并让我向吴老致候。吴老见我尚年轻，又是北京口音，便问我是哪年“北林”毕业的。我笑答：我并非“科班”出身，对植物学是“看图识字”水平，想请您这样的名家点拨，如蒙不弃，愿拜您为师，希望在植物分类上多赐教。吴老见我坦诚，很是高兴，结合我送去的标本，耐心地讲述了植物分类鉴定的基本要领。最后，还向我打听肖所长近况，让我转达他的问候。肖所长要我请吴老帮助鉴定植物标本时，也每每要我向吴老问候。通过目睹吴老的植物鉴定和热心讲解，不仅使我学到许多植物学知识，掌握了植物分类鉴定的基本方法和要领。而且，这些方法和要领，对我考证古籍记载植物，也提供了重要借鉴，使我的考证思路更加拓展，考据方法更趋完善。

吴老的得意门生、著名植物学家和科普作家陈介先生，是我的良师益友。我们都是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，他还是云南科普作协领导。所以，我们的接触机会更多，对我植物分类知识的提高和古籍记载植物考证，都曾给予热情帮助和扶持。我受肖所长嘱托请吴老鉴定标本，有时就因吴老外出而请陈先生代为鉴定；我的《关于“海桐”原植物的考证》，便是陈先生推荐给《植物学通报》于1985年发表的。

我对古籍记载植物的考证，正源于科普创作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，我利用业余时间从事科普写作。为了增加作品的知识性和趣味性，收集了不少有关古籍史料。在云南的报纸和电台上，虽



发表过许多科普短文，但最受编者和读者喜欢的，则是《云南科技报》1979年8月10日发表的《树名小考》。我虽非鲁迅先生的话“胡适之先生的门人”，却自此染上了“历史癖和考据癖”。在科普创作中，最使我困惑的是当代专著中的某些植物，与古籍记载全然不符。这表明古今文脉已无法贯通。是古人的糊涂，还是今人的错误？为加以甄别、正本清源，“不愧对列祖列宗，有益于后世后人”，便开始进行古籍记载植物考证。

考证是以充分的史料和现实证据，以古验今，以今证古，在纠正前人研究错误的同时，给出正确的结论，是件极严谨的工作。所以，吴老对我的考证，既热情支持，又严格要求。因为稍有不慎，便可能出现新的错误。

“玉蕊”是唐代名花，其中以长安唐昌观的玉蕊最著名，白居易、元稹等著名诗人均有题咏，《剧谈录》还记载了一段神话传说。但唐代以后失传。近现代植物学专著有玉蕊科玉蕊属的玉蕊 *Barringtonia racemosa* (L.) Bl. ex DC.，但其形态特征和产地等均与古籍中的“玉蕊”毫不相干。经反复考证确认，传统名花玉蕊的原植物，即今山矾科白檀 *Symplocos paniculata* (Thunb.) Miq.。1981年，我被中国林学会借调去办科普期刊《森林与人类》，因编辑不适，曾聘请《植物杂志》刘金先生任兼职编辑。我将自己的考证结果告诉他，想写篇科普小品在他办的刊物上发表。他对我的考证颇以为然，建议我写论文发表，以免“浪费题材”。1982年回昆明后，我曾将这一考证结论先后告诉陈介先生和吴老。陈先生也认为有道理，作论文发表较好。但吴老却说，今“玉蕊”不是唐代长安名花可以肯定，若说玉蕊即今白檀，还需要给出更多论据加以论证。后来，我又收集不少唐代诗文的原始描述、宋代的有关争论、明代的更加含混和近代的各种误解，十易其稿，才得到吴老首肯。我的《唐代名花“玉蕊”原植物考辨》一文，直到1992年才在《农业考古》第二期发表。吴老对我考证的严格要求，充分反映了这位科学巨匠的治学严谨，这对我的考证有极大影响，避免因考证不充分而造成失误和遗憾，使我终生受益。而我最早发表的“海桐”原植物考证，结论虽正确，但对许多相关问题未能涉及。为弥补缺憾，又在2012年、2013年加以补充，重新发表《“海桐”原植物的本草考证》。吴老的教导，使我懂得了“厚积薄发”的重要性，所以，我30多年的考证，能纠正古今中日学者的考证失误、准确考订中名和学名的植物仅60余种而已。也就是说，平均每种的考证时间，需半年左右。考证的艰辛，可见一斑。

俗话说：“言教不如身教”。我虽无缘经常在吴老身边聆听教诲，但他那严肃认真、从容不迫、一丝不苟的行为，对我却影响极深。记得1984年3月初，我收到《森林与人类》编辑部一封信和一张选“国树”的表格（当时，我是该刊编委），让我请吴征镒先生填写。第二天早饭后，我便来到吴老家中，说明来意。当时，看样子吴老似乎准备外出，但他接过表格后，却不慌不忙，像小学生做作业一样，以他那特有的隽秀蝇头小楷，填起表来。这时，接他的汽车已到楼下，直接喇叭，段金玉先生也催吴老快动身，以免耽误登机。这时我才得知吴老要到北京开人大会议。看来，我这不速之客来的很不是时候，心中很是懊悔。便说：“等您开完会回来再填也行。”但吴老硬是将“入选原因”等项均填写完毕才交给我，动身下楼。我接过表格，感激的心情难以言表，只是说：“实在对不起。”这件30多年前的往事，对我触动极深，吴老以他榜样的力量和人格魅力，激励了我更加诚实做人、老实做事。

吴老的治学严谨，正体现在他的谦虚谨慎、不轻易下结论。1980年，云南省科协创办科普期刊《科学之窗》，我和植物所张浩先生（后调任云大外语系主任）等均参与了创办和编辑工作。当时，吴老兼任省科协主席，所以，我们在省科协也常与吴老见面。1983年，《科学之窗》第6期不



知由谁编发了《大树杜鹃何其多》一文，说在建水县红河北岸“发现了稀有的大树杜鹃林”。据我所知，大树杜鹃*Rhododendron giganteum* Forest et Pagg仅腾冲高黎贡山有分布。我向吴老提及此事，因为我知道，吴老对云南植被了如指掌，定然知道建水的所谓“大树杜鹃”为何物。吴老却说：“可以肯定那不是大树杜鹃，而是一种乔木杜鹃。到底是哪种乔木杜鹃，你不妨问问冯国楣先生，他是杜鹃科植物专家。”冯老也是我崇敬而熟悉的前辈恩师，对我帮助很大。冯老说：“云南的乔木杜鹃种类很多，建水红河北岸的，很可能是马缨花杜鹃*Rh. delavayi* Franch.。你可写篇文章介绍，以免以讹传讹。”于是，我在《科学之窗》1984年第3期，以“华隼”笔名发表了《大树杜鹃与杜鹃大树》，以正视听。

1986年3月初，我调离云南，筹办《河北林学院学报》，尽管办刊困难极大，我的考证却未中止，而且一直保持与吴老、冯老和陈介先生的通信联系。其中与陈介先生通信较多，因为我们对紫金牛属某些种的中名和学名考订，一直存在争议。尽管如此，陈先生与我却一直保持亦师亦友的情谊。

吴老不仅是一位治学严谨、诲人不倦的科学巨匠，而且是一位关爱晚辈的慈祥长辈。而我一直未曾透露、至今深感愧疚的是，我不仅曾对他主编的《云南植物志》和《中国植物志》中的某些不足提出过尖锐意见，而且由于对吴老语重心长的关爱，曾有严重误会而当面顶撞吴老，还以为是“我爱我师，我更爱真理”。而吴老却以他博大宽厚的胸襟，予以理解与包容。

1992年秋，我到西南林学院开会，抽空到吴老家拜望。当时，吴老正用英文伏案写作，见我到来，十分高兴，便陪我到沙发上聊了起来。他说：“你来得正好，我正准备给你写回信呢！你的那些考证，都有说服力，都有一定道理。”我见吴老正在兴头上，便建议由吴老牵头，申报关于古籍记载植物考证的自然科学基金课题。吴老说，他已退休，还有许多事情要处理，因而未获吴老恩准。后来，我又谈到陈介先生对“雪下红”“叶底红”和紫金牛属某些植物的学名考订有误，但多次与他沟通，他仍固执己见。吴老却说：“看来谁也说不清楚。”我觉得吴老此言有失公允，限于时间，又不能用具体论据证明自己判断的正确，便冒出了一句：“您说的不对，科学的东西必须能说清楚；说不清楚就不科学。”说完后，我便十分后悔，深怕这样当面顶撞吴老，使他接受不了。谁知，吴老并不介意，出于对晚生的关爱，吴老说：“考证是件苦差事，而且很难出成果。”于是，向我谈起抗战时期，他考证《滇南本草》的经验教训。吴老认为，过去我在云南搞的野生经济林木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、薪炭林和混牧林的营造等专题，都很贴近民生和实际，不应放弃。他还语重心长地说：“你还年轻，考证虽很有意义，但可从长计议。可不要整天钻进故纸堆里去。”本来，吴老是想用我也最爱读的鲁迅著作中的“故纸堆”一词，来增加点谈话的幽默感，但当时，我对此却产生了严重误解，误以为吴老不再像过去那样支持我搞考证了。此后，我便很少与吴老联系。限于条件，我无法再进行结合生产实际的研究，而我的考证则一直继续，退休后也未中止。

然而，吴老却不愧是胸怀坦荡的科学巨匠，不像我似的小肚鸡肠。尽管我十多年一直未与吴老联系，吴老却未曾把我忘记。2009年，吴老托人设法找到“居无定所”的我，希望我参与《中华大典·生物学典》中《植物分典》的编纂。这足以证明我过去对吴老语重心长的教诲产生误解，实在不应当。

我从《河北林果研究》（原《河北林学院学报》）主编岗位退休后，为扶持年轻一代，曾接受返聘。2003年后，为帮女儿料理生活和享天伦之乐而到北京。同时，先后受聘为《中国园林》《中国水土保持学报》编发些稿件，为《北京林业大学学报》社科版审些稿。期间，《河北农业大学学报》自然版因故编辑严重缺编时，我又回保定“救急”接收返聘。我长期在北京和保定两地奔波，且从不用手机，所以难以联系。谁知，2009年9月中旬，却在北京接到中科院植物所王锦秀同志电



话，说吴征镒先生对我长期坚持古籍记载植物考证，很是赞赏。现在吴老正主编《中华大典·生物学典》，希望我参与其中《植物分典》的编纂。因电话难以说清，且我与她素昧平生，便约好第二天在她单位面谈。见面后才得知，编典主要是整理古籍，以便精确考订植物学名，还可为今后修订《中国植物志》提供考据支持。并说，有什么困难可以提出，以便帮助解决。我立即表态：吴老是我崇敬的前辈恩师，对我曾给予很大支持和帮助，我已十多年未与吴老联系，承蒙垂青，敢不效力？编典是功在当代、利在千秋的事，若能通过编典，正本清源，对传承中华文化有重大意义。但我已年届古稀，只能承担部分任务，不过，我会将30余年的考证经验和积累，全都奉献出来，供其他编典同仁参考，全力支持吴老完成编典工作，义不容辞。我没透露半点个人困难。

实际上，当时我正陷入空前的困境中。老伴肝癌手术后出院不久，正在北京休养和后续治疗，我正负责照料。而且因药费太高且不能报销，我正寻求原单位和亲友的救助。经向家人做工作，终于得到理解与支持，我便于同年10月独自回保定。首先，将过去发表的20余篇考证论文加以总结概括，撰成《对几种传统植物汉名的订正》，分两次打印后寄给吴老，并写信表示积极参与编典，不辜负吴老的重托和厚望。

同年12月21日，收到吴老回信，其中说：“阅过论文，知您对植物名称考据不仅多有兴趣，而且很有成效。其中的执着和严谨令人敬佩。从现代的《中国植物志》到历代各类本草，植物名称的‘同物异名、同名异物’现象仍有存在，看来要彻底甄别，正本清源任务还是任重道远的，需要多人多方努力才能完成。实际上，您的研究已为这种努力做出了示范。”吴老的过奖，令我诚恐诚惶，我决心倍加努力奉献，不负重托，不辱使命。

于是，我独自在保定斗室之中，每天与青灯古卷为伴，与古人对话，在“故纸堆”里钻研，其中又有不少新的发现。

吴老在信中还说：“编纂《植物分典》涉及的重要方面之一，就是植物学名的考定。”还说，我已经考证的植物种可由我承担编纂，还可从编典框架中任编我所熟悉或有兴趣的类群。并交代有关具体的事宜与他的办公室主任吕春朝先生联系。但因我已考证过的植物种，分散在《框架》已由他人任编的各部或分部，所以，我便任编了考证难度较大尚无人任编的《待考植物总部》中的椴部、椴部、椴部、玉蕊部、杨栌部、卖子木部、海红豆部和放杖木部。鉴于古今中日学者对“彼子”和“榧实”的考定皆误，而我早已考定出其学名，经吴老办公室同意，我又任编了裸子植物总部的三尖杉部和红豆杉部，还任编了《框架》未列入的双子叶植物总部牻牛儿苗部“旱金莲”分部，以及藤黄部中金丝桃属几种植物。因料定其他编典同仁对“木天蓼”学名考订有误，还另外编写了“木天蓼”的编典材料并附以考证论文。为防止其他编典同仁采用近现代错误考订的学名，我又将自己已经准确考订出学名的葵、菟葵、吴茱萸、黄檗、黄栌、绣球、八仙花、琼花、荚蒾、粉团、八角金盘（草八角）、羞天花、鬼臼、马目毒公等，写成考证论文，提供吴老办公室，以便及时提供其他编典同仁参考。以此来践行我向吴老许下的“将三十多年考证积累和经验都奉献出来”的诺言。

而今，吴老仙逝已近周年，吴老的音容笑貌却如昨天一样浮现在我眼前。我尊吴老为前辈恩师，因为他不仅是植物学大师、学问大师，又是品行大师。他曾以高尚的人格魅力，为我树立了严谨治学的光辉榜样，又以深厚的学术造诣，开启了我在考据方法论上创新的智慧之门。鉴于吴老早年对“金丝莲（金丝荷叶）”和“八角金盘（草八角）”的考订已有大体眉目，我最近又向《植物分典》办公室提供有关两篇编典稿，作为对吴老的感恩，以完成吴老准确考订植物学名的编典宿愿。我想，这就是我对吴老仙逝一周年的最好纪念。

